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刘增人

1983年暑假,薛绥之先生用他那特有的“电报体”信函发来通知,要我去济南与几位学兄会齐后,南下赴厦门大学招待所报到,参加《鲁迅大辞典》撰写会议。到了会上,才比较具体地知道了会议的内容和参会的人员。

原来,薛绥之先生的老师李何林和王士菁先生共同发起,编撰一部严谨、科学、实用的《鲁迅大辞典》,而且,他们在北京已经探索两年有余,成竹在胸,这才召集各分册编撰人员讨论体例、具体分工。山东这片由薛先生牵头,具体任务是事件分册。薛先生召集了他的几个老学生,我是其中之一。会议的主干,自然是李先生执掌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批精英,潘德延、王德厚、陈漱瑜、李允经这鲁博的“四大金刚”悉数到会,还有姚锡佩等女将,也充分显示着鲁博的学术实力。

会上,有一位身材扁而薄的南方口音的学者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薛先生告诉我:他叫马蹄疾,原来姓陈,当过“小炉匠”,在工厂做过工,没有什么学历,完全靠自学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。后来终于被“刷”下来了,于是漂流到东北,干过记者、副研究员。人是瘦了点儿,但关于鲁迅的史料工作,却很扎实严谨……我于是特别注意观察这位虽然自称“马蹄疾”却丝毫不见任何“春风得意”迹象的传奇学者。

会议就要结束了,东道主厦门大学在闻名遐迩的南普陀寺请大家品尝更加闻名遐迩的“素斋”,我和一些不大有出息的人都很兴奋,想象着那即将享用的“素斋”,中午饭吃得就不多。下午四点多,一行学者文人齐刷刷来到南普陀寺,先瞻仰寺观,随即就被引进斋堂就座。直到大家都等得焦躁不安时,小和尚们才每桌送上一本极其精致典雅的菜谱,说菜名都是郭沫若给起的。好像也确是郭老的韵味。我只记得两味:月满西楼,平沙落雁。前者是多半盘豆腐羹,右边半株烫熟的油菜,油

邂逅马蹄疾

他没有炫目的学历与职称,没有批发或零售来的理论或词语,但扎实、刻苦、认真,坚守,敢于和生活叫板,更乐于和自己叫板。倘若天假以年,其成就绝对可以令世人刮目相看。

菜叶上,放半个煮熟的鸡蛋。后者是多半盘鸡蛋羹,羹上沿摆了一行切碎的黑木耳。但也许是等得太久,也许是郭老的名字起得太唯美,第一盘还没有转到我面前,已经盘底朝天,干干净净,而率先发起攻势的就有马蹄疾。前几味菜肴,大都是一轮扫光。渐渐地,诸位的战斗力减弱,有时就剩菜在盘。等到第十九味,已经没有人扫一眼,好多美味,遂弃之如敝屣矣!那时只图快吃,竟然未及仔细品尝名寺名菜的韵味,可惜啊可惜!

我和马蹄疾再次不期而遇,已经是1990年秋冬。我奉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我和冯光廉先生合作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发展史》,大约四个月,就住在该社二楼的客房。按说这是国家级的“大社”,至少应该有个稍微像样的招待所,可惜——没有。来社改稿的作者,好像都在这所谓客房“打尖”。刚住下,就分外惊喜地发现同屋的不是别人,正是久违了的马蹄疾!我才知道此前国内有两组人马都在编撰这完全相同的一部书。几经协调,两家并为一家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其成。而社里人手短缺,于是他就被借调来京。

我和马蹄疾分别住在客房的两个角落,各人有自己的事情,自己的生活方式,各不干扰。

我起床较早,先到社门前马路溜达半圈,就找家早餐店对付肚子。一般是豆浆加油饼。北京人不兴吃油条,咱只好入京随京了。中午社里有只供应本社职工的内部工作餐,我请小鼎兄代买了饭票,厚着脸皮去蹭饭。晚上就没准了,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解决,大多数是阳春面或素包子,外加一个茶鸡蛋。马兄的生活方式是我见过的最刻板的一种。一般在9点前起床。第一件事,是把昨天已经装好的电饭锅的插头塞进电源,锅里一般是大米、猪肉、水。然后拿起唯一的

杯子,牙刷牙膏毛巾都一直躺在脸盆里,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。他完成任务回来,锅里的内容恰好到点。于是拔下插头,从抽屉里掏出一包榨菜,把锅里的饭菜合一物一分为四:早上四分之一,中午两个四分之一,晚饭解决剩余的四分之一。吃完,一杯白开水——天天如此,从未改样。吃完立马把小锅往桌底一塞,拉过稿纸就写。我看得久了,免不了好奇,就试探着问:你长年如此,身体受得了吗?他头也不抬说:营养够了。我当学徒时,哪有这么多好东西吃?

我改书稿,是完全遵照责任编辑的意见,有的润色,有的调整,有的推倒重来。引文不规范,就必须到社里的资料室寻找权威版本,重新核实校正,因此跑资料室的机会多。我不论出去还是回来,马兄都是一个姿势——低头写作,没有思考的过程,没有推敲的余闲。我问他:你这里没有任何参考书,也不跑图书馆,靠什么写作?他指指脑袋说:早就储存好了,像自来水管一样,拧开便来。我除去叹气、佩服外,一句话也接不上。给养断了,他匆匆忙忙上街补充,顺便寄出一宗稿子,或者到邮局取一笔稿费,从不空手来回——标准的计划经济模式。小鼎兄告诉我,马兄家计艰难,工资全部留给沈阳的老伴,他自己在这里完全靠稿费度日,每过一段时间,夫人还要来取走剩余的稿费。我在那里几近四个月,没有见过马夫人一次。但我回青岛两次,听说马夫人来过我们的客房。毕竟外面的旅馆费还是太贵一些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就天各一方,音信断绝。后来听说他刚刚六十岁就遽然长逝,一肚子宝贵的现代文学史料,典故,一肚子千金难买的扎实学问,也一并长逝如流水,东去难寻觅!我和马蹄疾只有这两度萍水相逢,素无深交,但我一直忘不了他伏案疾书的样子,忘不了他瘦削的肩头、细长的手指。他没有炫目的学历与职称,没有批发或零售来的理论或词语,但扎实、刻苦、认真,坚守,敢于和生活叫板,更乐于和自己叫板。倘若天假以年,其成就绝对可以令世人刮目相看。

这样的学者,现在很容易被忘记,但也未必永远被忘记。

(本文为著名学者,青岛大学教授)

【生活直击】

□常跃强

说起“画骗子”,年代久远,我知之不详。说个宋代的吧,就说大书画家米芾。《富和书谱》中说他“兼喜作画”,《蔡志》中则说他“尤善临摹,至能乱真”。《画史》中说:“大抵牛、马、人物一摹便似……”可是,就是这个对“牛”一摹便似的人物,有一次却大跌眼镜,弄得自己颜面尽失——

事情是这样的:有个画商向米芾出售戴嵩的牛图,米芾粗粗看过之后,让他先把画留下,说是看几天再定,那位画商留下画就回去了。之后,米芾闭门谢客,在家观察揣摩了几天,自以为成竹在胸,就自己临摹了一幅。经一番处理,就装裱了起来,然后米芾把两幅画比较了一下,没找出任何破绽,心中暗暗得意。过了一段时间,当那个画商来取画时,米芾拿出来两幅牛图,让那个画商把自己的画取走,画商难辨真伪,竟把那张假画给取走了。过了几天,那位画商差店里的小伙计拿着假画来了,要求米芾还真的。米芾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,而是问他:“你根据什么说不是真的呢?”那个小伙计说:“你这张牛眼睛里没有小娃娃,俺那张里有小娃娃。”原来,真画里牛眼睛的瞳孔里映有牧童的影子,而米芾的仿画里没有。至此,米芾才恍然大悟,不得不叹服古人作画的精妙入微。

明代嘉靖年间,松江华亭(今上海松江)出了个董其昌。董其昌是明代后期著名书画家、书画理论家、书画鉴赏家。董其昌才艺虽高,但人品低劣,竟然放债霸产,诱奸民女。可恨的是,董这个人不仅人品差,画品也不高,我说的这个画品不是说他画得不好,关键是这个人造假画。他有不少画徒,当他看到他们画得有几分像他时,他就在画徒的画上题上他的款,盖上

画骗子

中国的书画界怎一个“乱”字了得!假画充斥,你想要谁的就能给你造出谁的,铜臭气熏得人倒仰。

他的印章,这样一来,画徒的画就变成董其昌的画了,画也就随着大大升值。这些帮他造假画者直到今天仍有名有姓,像赵左、赵迥、沈士充、释珂雪、吴振、吴易、杨继鹏、叶有年等人,其中吴易、杨继鹏二人还代作书法。所以,要想得到董其昌的真迹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,董其昌的姬妾倒有他的真迹。因此,《明季北略》中说:“家多姬侍。各具绢素索画,购其真迹者,得之闺房者为多。”

国民党统治时期,书画作伪已成普遍现象,甚至已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——据说有个上海人在纸笺中找到了一幅小幅的马画,大约是什么画家打的画稿,上面既没有题款,也没有印章,但纸幅虽已团皱,却尚完整不缺。这人一看就动起了歪心眼,他认识康有为,于是就把这幅画装裱了给康有为看,请康在上面写“天马行空”四个草书,并题一跋。待这事做成之后,他就把这幅画大加宣传,说南海先生不仅能书,且能作画,而且画板矜贵,一般不轻易动笔,这幅是偶然兴到为之,实乃稀世的珍宝。经一番宣传,这幅马画的价值就大大地升值了,末了由某富商收去了,那人狠狠地捞了一笔。

改革开放以来,长河奔流,大浪淘沙,淘出来不少闪亮的金子,当然也冲刷下许多恶臭的垃圾,这些腐败物,又吸引来不少闻腥逐臭的嗡嗡叫的苍蝇。别的不说,中国的书画界怎一个“乱”字了得!假画充斥,你想要谁的就能给你造出谁的,铜臭气熏得人倒仰。某一日,有一位画家的学生请我吃饭,坐定之后,我说:你一个学生,没什么钱,这顿酒饭就由我来结账吧!他听了这话,含笑不语,微露讽刺之意,说:常老师,咱先不说这个,喝酒喝酒!他

酒量很大,当喝到很有些酒意的时候,我问他:你老师这几年光是房产就十来套,还买了好几辆新车,即便是他的画好卖,他也得画出来呀!

那学生一听我说这,哈哈一笑,指着我说:常老师,这一块水深了,外行人只能看到水纹,里面到底有啥,你打死他他也不可能知道!

我笑着调侃道:莫非它比大海还要深?

尽管酒后吐真言,但他还是话到嘴边留半句,眯着眼笑着说:常老师,喝酒喝酒,咱不拉这个,规矩,这是规矩!

然而,当那酒再过三巡之后,他还是禁不住吐了实言,小声道:现在我老师成名了,社会活动多,再说你也知道,他画得挺慢的,一天也做不了几幅画。他的那些画呀,其实都是我们这十来个学生给他画的,画好了,他看着行,就题个款,盖个印章,这画就走了……

唔……我问他,那你们怎么分成呢?三七开。老师七,我们三。

……歌直的人什么年代都有。你就说在民国时代的大上海吧,有一位金石家叫褚礼堂。他精于鉴赏,鉴别书画的眼光很毒,经他鉴赏过的东西,没有走眼的。当时上海的收藏家如张石铭、奚萼铭等,收购书画,大都请他审定真伪,得他一言为标准。于是一班书画商和书画掮客就私行贿赂,请他指定兜售的东西为真品,不料他态度严正,一概拒绝,说:“我岂能因此而自堕人格!”

1943年褚礼堂先生贫病交迫而死。褚先生让我肃然起敬,这是一位宁死也不当画骗子的人呀!

(本文为作者为知名作家)

被尊为“亚圣”的孟子故乡邹城市境内,有四座名山,分别是葛山、峰山、铁山和岗山,被合称为“四山”。这四座山都不高,但名扬四海,最大的原因是山上均有北朝的佛经摩崖石刻,这些石刻被学术界称为“四山摩崖刻经”。刘禹锡曾说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”仙是道家文化,而此“四山”的得名,却是多赖其上的摩崖佛经。所以我们不妨改一下上述刘禹锡的句子,姑且叫做“山不在高,有佛则名”吧。

邹城的北朝刻经由来已久,自古以来就有“四山”之说。古时候的“四山”与现代的“四山”不同,那时候的“四山”是指相隔不过三十华里的尖山、铁山、葛山和岗

【碑刻漫话】

邹城四山佛经摩崖石刻

□杨加深

山,其上的佛教刻经史称“古邾四山摩崖”。上文所说的现代“四山”——葛山、峰山、铁山和岗山的得名,同样也是由于其上的佛经摩崖刻经。1988年,铁山、岗山摩崖石刻首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06年,葛山和峰山摩崖石刻也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因此才有了现代的新“四山”概念。

那么,为什么老“四山”中的尖山被新“四山”中的峰山所取代了呢?这仍然涉及“有佛则名”的问题。原来,在山东境内刻有北朝摩崖刻经的山主要有八座,除上文提到的位于邹城境内的五座山外,还有泰山、水牛山和徂徕山。其实,此前的尖山也是以佛经摩崖石刻著名的,其中有刻经纪年“北齐武平六年”(576年)数字,可见尖山刻石由来已久。尖山还有一个别名,叫大佛岭,原因是山上刻有“大空王佛”四个大字,字径约2米,是目前所见最大的刻字,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称之为“大字鼻祖,榜书之宗”。山上共有刻经七种,此外还有数种散刻的佛经偈语。所以,无论从刻石年代、字径还是刻石数量上讲,尖山在老“四山”中均居首位。可惜的是,1960年当地村民开山采石,尖山摩崖石刻被破坏殆尽,今仅存拓片。本来的一座文化名山,却因为人为的破坏不再受世人关注了。

与尖山刻石刻于北齐(550—577)不同,新“四山”石刻均属于北周(557—581)时期。铁山摩崖刻经在铁山之阳的一块花岗岩石坪上,总面积达1037平方米,是新“四山”摩崖刻经中面积最大的。石屏中间刻有字径约60厘米的《大集经·海慧穿菩提品》,刻石时间为北周大象元年(579),现存795字。左侧刻有《石颂》跋语,记述了铁山刻经的地理位置、时代背景、经主、刻经年月及对书法艺术的评价。下部为《题名》,记载了经主及佛经书写者姓名,尤其是第六行中的“东岭僧安道壹署经”数字最引人注目,因为安道壹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齐高僧书法家。

岗山摩崖刻经刻在山阴兰花谷内三十余块花岗岩石壁上,是四山中刻石数量最多的。该摩崖石刻刻于北周大象二年(580),较有名者,有字径40厘米、隶楷相间的《入楞伽经·请佛品第一》,字径20厘米带有楷意的《入楞伽经·请佛品》,字径15厘米以隶意为主的《佛说观无量寿经》,还有《佛号》、《佛名》及题名和刻经年月类的刻石。

葛山摩崖石刻在葛山西麓的一整块花岗岩石坪上,刻石时间是北周大象二年(580),经文内容是字径40—60厘米的《维摩诘所说经》,刻经隶楷相间,与铁山刻经笔意相通。

峰山摩崖石刻有两处,一处是五华峰刻经,上刻《文殊般若经》,有经文11行,每行10字,现存72字;另一处是妖窟洞石刻,有经文7行,每行14字,现存75字。

邹城,是亚圣孟子的故乡、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,在这块圣土的四山上,却布满了巨书深刻的佛家经典。四山佛经摩崖刻石,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,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种特殊的书法现象。它大大丰富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,使佛经与山石并寿,与自然融为一体,充分体现了佛法无边的博大气象,其书法或经书丹,或直接凿刻,雄浑博大,气势恢宏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北朝时期恰逢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演变期,摩崖刻经中隶楷相参的书法成为当时汉字字体演变的活化石。而从旧“四山”到新“四山”的转变,也充分说明了文化对于自然山川的影响,它时刻提醒人们,要保护文化遗产,传承华夏文明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